

文学与文坛

侯发山

好多人把文学与文坛混为一谈,其实不然,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文学是寂寞的,文坛是热闹的;文学是纯粹的,唯美的,文坛是世俗的,功利的……

说得更明白一点,文学是要水平的,是要真本事的,没有两把刷子伺候不了文学。而文坛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味了,是要手腕的,玩手段的,不懂得文学照样在文坛上风生水起,给外人一个“大家”的模样、“名家”的姿态,要的是待遇,要的是名利。其实,真正热爱文学的人,是不在乎文坛的,更不在乎自己在文坛上的位置。曹雪芹,他不是作协主席,也不是专业作家,县一级的作协会员都不是,更不要说创作几级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了,但是,他的《红楼梦》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老人知道贾宝玉,小孩知道林黛玉。施耐庵,考中进士后,放弃优厚的官场待遇,回到老家闭门写作。他也没有什么头衔,同样鼓捣出了传颂古今中外的《水浒传》……可能有人会说,那个年代没有作协这个组织,没有文坛这个概念,那就说近,我的贵编《传奇故事》首席编辑汪溟老师,在《花城》、《莽原》、《钟山》等大型文学刊物发表中篇小说五十多部,出版了《八戒传》、《贾宝玉的自白书》等多部脍炙人口的长篇,但是,他并没有加入任何组织和协会。有朋友曾问他原因,他淡淡地说:“我爱文学,不爱文坛。”无独有偶,原《巩义报》副总编辑贺宝石老师,不说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,但是学识相当丰富,出版了几部专著。每一个业余作者找到他,他都认真地给予点拨,是巩义文学界公认的老师……曾有“巩义的杜甫”之称,称得上德艺双馨。但是,贺老师至今仍不是任何级别的协会会员,不是他不会申请,而是他根本不屑于这些玩意儿。

近年来的鲁迅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等奖项的评选,每次结果出来后总是骂声一片,认为该评的没评上,不该评的倒评上了,让外界人幸灾乐祸看笑话:“瞧,作家就这素质!”弄得读者也茫然然,不知道哪些是佳作哪些是拙作。真正热爱文学创作的人不在乎奖不奖,在乎的是自己的作品,在乎的是自己的心灵感受。记得有一位作家说过类似这样的话:“我宁愿写出一部让一个读者看一百遍的作品,也不愿写出一部一百个读者看一遍的作品。”我认为,这话说得很有见地,也赞同这样的说法。在他们眼里,文学是至高无上的,文学是他们的兴趣爱好乃至理想,他们没有把写作当成谋生的手段,更没有把写作当成出人头地的门径,因此他们的写作较其他作家来得更加温暖、更加纯粹,更受读者欢迎。

俗话说,有心插花花不发,无心栽柳柳成荫。在文坛上很活跃,一心想弄出些动静让大家都记住的人,只能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柄和谈资。相反,钟情于文学,不计名利,反而能写出好东西,或许,他们才是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。

新书架

《肉身供养》

宋凌燕

所谓“肉身”就是生命的载体,“肉身供养”也就是人们对于生命、心灵更深层次的思索与修行。

在这部书中,将邀与您分享关于文明、艺术、肉身最美的沉思。哲学与美学、宗教与美学、传统文化与美学在这里充分地交融。作者的思路天马行空,博大高妙,而于细微处都是娓娓道来,深入浅出,配以全彩美图,读来更是双重享受。

北京城里人住着“四合院”

20世纪50年代,北京城里最常见的住宅是四合院。如今散落在市区的名人故居和王府一般都是比较正宗的四合院,如前海西街的恭王府。近年来北京的高楼大厦越建越多,四合院已经不多见,现在只在二环路还有两片较完整的四合院区,再过些年怕只能在影视剧里一睹它的尊荣了。

四合院的典型特征是外观规矩,中线对称。正宗四合院一定要有正房、东西厢房和中间庭院。讲究的四合院除了大门,还有第一进院、大堂、第二进院、书屋、住宅等,两侧有厢房。各房有走廊和隔扇门相接。

1958年的“大跃进”和“人民公社化”运动开始之后,四合院也进行了公有化尝试。当时北京城里的四合院多是私人拥有产权,北京全市约有房屋120万间,其中92万间都是私人产权。北京的城市建设,使得一大批农民工到了北京就转成了城市户口,但他们没有房子,都在单位临时盖的集体宿舍里。四合院的公有化尝试,给许多面临结婚生子的外来

务工青年打开了方便之门。

四合院按人口多少分配面积,一般人家都分到一间房,少数人家分到两间房。这样一来,一个是公共厕所,卫生条件差,老街坊们管这叫“闻着味儿回家”。

比四合院差一些的住宅是排子房。“排子房”也叫“兵营式住房”,据说,这种坐北朝南、成行成排的房型,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。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、便于管理、向阳保暖,那时被广泛采用。

这种房子进深短,一开门室内一览无余。大多数人家用“阳光换厨房”,挡住自家向阳的前窗盖起小厨房,由于终日难见阳光,室

内大多“黑糊糊、油腻腻”。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,“排子房”把门的首户大多是个公共厕所,卫生条件差,老街坊们管这叫“闻着味儿回家”。

潮人参加“周末舞会”去 马克·吕布是20世纪50年代首位获准进入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,后来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到中国。1957年左右,他在北京拍摄了一张照片,是一位普通的北京工厂职工结婚的舞会,舞会场地像是工会办公室,或者是工厂夜校的教室。在照片上,男性穿着灰黑的人民装和干部装,女人在她们的棉袄外套了一件花罩衫。

尽管是婚礼,但人们表情则都很严肃,甚至呆滞。前景中有三对男女,他们虽相拥而舞,但相互没有眼神的交流。左边一对,男的无精打采,头发梳理得相当整齐,女的抿起嘴唇把脸转向另一侧,好像在想心事;右边的两位,我们只看到一个男人的后脑勺和脖子那儿露出一截花格围巾,他的女舞伴似乎正在走神,面无表情地斜视着画面外的一个什么东西;中间一位小伙子低垂双目,好

遥想萧红

张健奎

债。她无奈向报馆疾呼,结识萧军,几经颠沛流离,终与萧军走到一起,开始写作,共同出版了《跋涉》,从此走进文学天地,也因此被日伪统治者注意,上了黑名单,不得不撤离奔赴青岛,虽经一路盘查,还是顺利到达,一对情侣,几番磨难。如今周围新建了楼房,已看不到大海听不到涛声了,遥想那时的萧红,瘦瘦高高,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,常常用天蓝色的布条扎在短辫上,虽然常常是破衣烂衫,连黄皮鞋也是后跟抹了一半。平日她会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,做俄式菜汤。饱餐一顿之后,还会和朋友们到栈桥到水族馆游荡。高兴了就唱歌就下海游泳。那时的萧军,常常脖子上带着黑蝴蝶结,弹着三弦琴和萧红一起在山道在海边在一条条老街上徜徉漫步。

萧红当时的日子还是清贫的,房间里只有借来的家具。尽管有朋友聚会的快乐瞬间,更多的时间她用来写作,东北老家的苦难暂时远离,心底压抑的感觉在她提笔时阵阵袭来,生活中暂时忘掉苦难,写作时却愈发清晰。萧红在写:写东北土地上贫穷的草芥不如的人们蚂蚁一样的生活,祖祖辈辈。写他们在城头变换太阳旗,遭日本侵略时真实的野性的奋起,壮怀激烈。这就是她的成名作《生死场》。和同时代的女作家不同,冰心是从探索妇女解放发韧,冯沅君、丁玲写恋爱婚姻与社会矛盾起步。萧红的小说一开始就写陷入绝境东北农民,就系着中华民族的魂。

此时,萧军在写《八月的乡村》,也是取材于日寇侵略下的东北农村。写作就是他们生活中的精神支柱。在这座小楼这间有太极图的房子里,两人奋笔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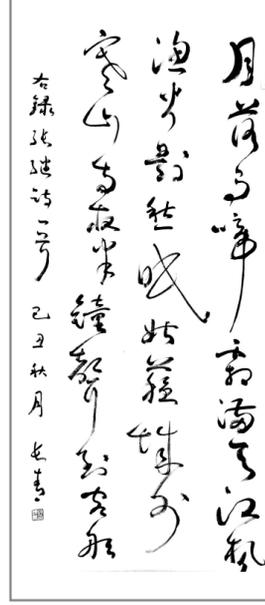
书,“每至夜阑人静,时相研讨,间有所争,亦有所励也。”后人形容他们是在度精神蜜月。萧红的《生死场》写得清丽写得纤细写得大胆,萧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也写得才情四溢。他们在自己营造的爱河里,挥洒着他们的情缘和才情。

作品在哪里发表?就写信给鲁迅,投石问路。当收到鲁迅回信的时候,他们一遍一遍地读,几乎要背下。那时在清晨,他们面对大海感觉到金色的阳光;在夜晚,他们看见海面上的灯塔闪亮。他们汲取着来自鲁迅的向前的新生力量。萧红一遍遍念着鲁迅的信:“可以看一看稿子。”她神采飞扬。

鲁迅为《生死场》作序:“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,对于死的挣扎,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,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,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。”为萧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作序:“显示了中国的一份和全部,现在和未来,死路与活路。”这两部作品,结晶着他们的爱情。这就是从1934年6月至同年11月,萧红在青岛的日子,是他们永远怀念和纪念的地方。此后,因了鲁迅的感召和影响,萧红的写作并喷发涌,爱情却起起落落开花谢花谢离破碎。

萧红另一处故居在她生长的呼兰县,作家白桦曾在那儿感叹道:人生若溪,坎坷如歌。萧红31岁的青春生命唱尽了她委婉纤细的歌,也唱尽了她雄健豪迈的歌。

站在萧红短暂生活过的青岛驿站站前,看不见她写作的身影,听不见她的爱情絮语。“尽有伯牙琴韵在,高山流水那堪闻”。



赵长青 书法

知味

鲜奶面条

夏爱华

金秋时节,策马奔驰在辽阔的伊犁大草原,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。而营养美味的鲜奶面条,作为新疆特色小吃的一种,在这里才能够品尝到。即使是新疆人,如果住在繁华都市,也吃不到。鲜奶面条来自美丽的大草原,当远方的客人来到草原时,才能享受到这种小吃。

在草原做客,可以喝到热腾腾的奶茶,吃到香喷喷的手抓肉、那仁。

肉食吃得差不多的时候,主人会端上来一道营养滋补的美食——鲜奶面条。

鲜奶面条要趁热吃,按顺序,应该先吃面条后喝奶汤。原则上不能剩饭,应该连面带汤全吃完。面热汤鲜,这道美食,还具有醒酒作用。所以一般来说是最后端上桌的,作为一顿美餐的压轴。有人还喜欢往鲜奶面条中放入切成薄片的酸奶疙瘩,汤中会带有一种淡淡的酸奶的酸香,十分可口,而且利于消化。

鲜奶面条制作并不麻烦,最重要的是牛奶要新鲜。在草原上做客,主人都是现挤牛奶做这道小吃的。新鲜牛奶甘甜鲜美,放入锅中烧开,加入手擀的面条。面条不是条形的,是切成片状的。形状有点像揪片子和面旗子。面条切成菱形,以增加面条形状的美观。随后放入熟羊肉丁、盐、洋葱调好味,最后加入香菜和辣椒油,分别装入碗中,就可以端上桌了。

有人喜欢在鲜奶面条中放入各种蔬菜,好吃又好看。比如放入西红柿丁、萝卜丁、菠菜段、土豆块等。一碗鲜奶面条,洁白如玉,面条,或者说是面片更合适,精致可爱。辅料颜色丰美,红橙黄绿,诱人食欲。

鲜奶面条的营养在于,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脂肪、蛋白质、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。面条中富含糖类,又能与牛奶中的营养成分相互配合,互为补充,使其营养成分更趋于合理,有利于人体的消化吸收和营养平衡。

远方的客人,欢迎你到新疆,品尝美味的鲜奶面条。

掌故

“后庭花”是什么花

阎泽川

唐代诗人杜牧在秦淮河夜泊时,听到对岸酒家的歌声后创作了“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”的诗词,李商隐在讽刺隋炀帝时也写下“地下若逢陈后主,岂宜重问后庭花”的名句。那么,“后庭花”究竟是泛指栽在后院的诸多花卉,还是专指某一种花名呢?

宋代文学家苏辙在《寓居六咏》中写下:“后庭花草盛,冷汝泣(通‘系’)兴亡。”句后自注:“或言矮鸡冠即玉树后庭花。”这是具体指出“后庭花”花名的最早记载。稍后的玉灼在《碧鸡漫志》中叙述后庭花的源流时也提到:“吴蜀鸡冠花有一种小者,高不过五六尺(尺,一作寸),或红或浅红,或白或浅白,世人曰后庭花。”明末陈仁锡在一部类书中说得更为具体:“寿星鸡冠即矮脚鸡冠,有浅、白二色,即后庭花也。”

乾元街往事(上)

王瑞明 郭培磊

北乾元街、南乾元街形成的时间较晚,但正赶上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,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河南省主席。冯玉祥将军上任后曾长驻郑州,在冯的倡导下,郑州开始推行新政,加快城市建设。在修马路、拆城墙的同时,选址较为偏僻的乾元街,借南城壕外的秀丽风光,相继建立了当时郑州唯一的平民公园,供广大百姓游览观赏。接着还建有平民学校、平民图书馆、贫民伤残救济所等。一个个顺民意、得民心的市政建设往事至今还留在老郑州人的心目中。

平民公园位于郑州老城西部小西门外,东临南城壕,西面、北面是乾元街,南邻中华医院,公园正门面向乾元街。1927年10月,由冯玉祥将军拨款

2000元筹建,经过5个月的施工而建成。场地以接受慈善公会房地产及护城河为主,面积约有8市亩。园内的平面布局,自东向西分为3个部分:

东部为花卉区。有地栽和盆栽的花木。为提高公园档次,冯玉祥将军下令专程从彰德(今安阳)运来盆花648盆,翠柏246株,以及无花果等花木。东南角建有1个八角草顶凉亭,为园内的最高处。亭内翻有水泥桌子、水泥凳子。

中部为游乐区和学校。其南段有一游乐场,设有中山俱乐部、运动场、游艺室。配置单杠、双杠、轧板、跷跷板、秋千等体育运动设施和游戏器具等,供附近的公职人员、学生、游人锻炼身体和娱乐。其北段为著名的平民学校。

西部为阅览区。主要建筑为一处四合院,里面为平民图书馆。

连载



像连话都不想说,而那个握住他手的姑娘,略有羞涩之意,只有她的表情,保留了一点鲜活的可以捉摸的人的情感。

那时候,大城市几乎各单位都要举办“周末舞会”。这种“周末舞会”也几乎成了50年代城市人最具吸引力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。舞会要求非常严格,参加舞

会的人的仪表与着装都要整洁。男同志头发不能太长,必须剃过头。衬衫领扣、袖扣都要扣好,热天也不能穿西装短裤。女同志不能披肩发,裙子长度必须过膝,或者穿长裤,除文艺工作者化淡妆外,一般都不化妆,展现一种健康的自然美。

在舞会进行中,场内秩序井井有条。比如跳快三步,必须朝一个方向转,因而舞场里大家的动作整齐划一,体现着那个时代的集体主义精神。跳舞的人脸上可以稍稍有点愉悦表情,但又绝不能流于轻佻。

一些青年人参加舞会上舞台,也想过化化妆。1956年5月11日上海《青年报》介绍了怎样化“青年妆”:

化妆开始先擦上些凡士林,塞住毛孔,就可以上底彩了。底彩一般用棕色加肉色,嫌黄时可添上些嫩肉色。

打好底彩后,就画鼻子。一般用大红油彩加黑眉笔或黑眉膏(黑油彩太稀容易滑掉)。画鼻子时,不能给人有淡了的感觉,要中间深,渐渐往两边淡下去,使人看上

去是个柔和、自然的立体。

在介绍了画眼睛、画眉之后,文章继续说:接下来是上面颊红,它的作用很大,可以利用它来改变脸型……男同志在打面颊红时(红色加棕),要擦得淡些,女同志要鲜艳些。

在那个年代,这就叫化妆了。1956年某一天的《人民日报》,对上海的舞会提出批评:举行舞会的风气,目前在上海的工厂、机关里颇为盛行,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:铺张浪费者有之,贪污腐化者有之,聚众斗殴者有之。

据调查,国营上海广播器材厂等三个工厂其中有两个厂自己都有不小的场地,但举行舞会却要租用大舞场。他们几乎租遍了原来上海出名的跳舞场所,什么四姐妹舞厅、爱而林舞厅、大沪书场……都有过他们的足迹,排场大要花钱,于是就采用卖舞票的办法,票价由一角、二角甚至卖到六角、八角,有时竟出现了“黑市”,贪污票钱的事,当然也随之出现。

到了60年代的国家经济困难期,中央下文明令禁止举行舞会。温情脉脉的互助储金会 20世纪50年代,很多家庭有接好几个孩子的情况非常普遍。当时没有口服避孕药,只有几种操作麻烦,效果也不是很有保证的外用避孕手段。即使有些夫妻不想多生孩子,但也无法跟良好的生理功能相抗衡。而且,那时候对人工流产的规定也非常严格。如果本人不是因为健康原因,或者医学上认为的必须,而是由于自身工作、学习上的需要或子女过多想要实行人工流产,机关干部须经该机关的人事部门负责人批准,市民则须经街道办事处证明,医院才会施行人工流产。1956年出版的一本宣传避孕的小册子,就对一对普通夫妻的烦恼引出这个话题。丈夫是机关职员,妻子是纺织厂工人,孩子越来越多,他们的生活也从刚结婚的轻松愉快,渐渐演到烦躁不堪,靠工资养活几个孩子和父母,怎么精打细算都觉得吃力,经常还没到月底财务上就青黄不接了。